

江青：韓愛晶給我寫幾次信，講這個問題，韓愛晶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一是脫離工农，二是脫離实际，一到我跟前就想將來，總說几十年以後的事。還問我第三次世界大戰什麼時候打？

主席：想得遠好。這個人好啊！這個人好啊！我們有幾種死法：一是炸彈炸死，二是病死，被細菌鑽死，三是被火車、飛機砸死，四是我又愛游泳，被水淹死，無非如此。最後一種是壽終正寢，還是細菌么！

聽說劉少奇也救活了，劉少奇、薄一波幾乎死了，得了腎炎、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四種病。四、五個醫生救，兩個護士才救過來，脫離危險期了，你們聽說了嗎？

文元：歷史發展規律總是前進的，曲折 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澤東思想，相信羣眾。我批評韓愛晶是悲觀主義。

韓愛晶：一次總不能勝利，肯定有曲折，按辯証法。

主席：一次前進是沒有的，歷史前進總是曲折的。一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勝利了以後，又出現黨聯盟，廬山會議後彭德懷，現在走資派。

象蒯大富那個“徹底砸爛舊清華”，~~四·一四說教員也有好的，可你老蒯說的徹底砸爛不~~也，四·一四說教員也有好的，可你老蒯說的徹底砸爛不砸爛好人，而是一小撮壞人。你把含義講清楚，他就不倒了。

趕快把領來，集中起來，你們全毛覺，明天再開會。再。

江青：你那個樣子，~~難~~，對你也是個鍛煉。（~~走~~與首長握手走了，江青把~~不~~手走了”）

毛澤東思想萬歲



00302

「毛澤東思想萬歲」

第二輯

00302

毛澤東思想萬歲

一九六七年

，有一點就給拿走。這是個大事，民心不安，軍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購糧款也被公社拿走，國家出了錢，公社攔腰就搶。：：：什麼叫共產主義？還不是公開搶！」（第二輯第三九至四〇頁）

不過，這本「毛澤東思想萬歲」雖然含有上述的錯誤和遺漏，但是它最少有兩大特點：一為大都是未經公開發表的資料，具有原始性和機密性，例如其中有一篇「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結束語」，毛澤東就提到：「這個東西不準備全部公開發表，因為有些問題比如講罷工罷課這個問題，一公開發表，那好吧，全國就罷起來吧！」（一〇〇頁）。另一個特點為有些講話是經過錄音而紀錄的，具有真實性和可靠性，例如毛澤東「召見首都紅代會負責人的談話」，據說就是經過錄音而整理的（六九八頁）。由於具有這兩大特點，從「毛澤東思想萬歲」中實可透視毛澤東的性格和陰謀，以及中共的政策和內幕。

- ✓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88—89
- ✓对《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和《目前农村中閑話較多的是那些人》二文的批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90
- ★右傾机会主义者为什么現在发动进攻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91
- 关于枚乘“七发”(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92—93
- ✓給詩刊編輯的一封信(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 94
- ✓对彭德怀九月九日的信的批示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95
- 附录：彭德怀的信(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96
- 在中共中央軍委扩大會議和外事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97—101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議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102—103
-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月、十月) 104—115 部分重
-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116—120
- ✓对《答AB薩宁那和BT溫什尔两同志》的几段批語
(約一九五九年) 121—122
- ✓辯証法例举(摘編) 123—151
- (一) 懂得分析，就是懂得辯証法 123
- (二) 什么事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較，才是辯証法 123—124

(三)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 本质与现象的.....	124
(四) 看问题要看本质, 要看主流.....	124
(五) 对立统一与相互转化.....	124—127
(六) 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 作斗争中形成的.....	127—128
(七)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128
(八) 有紧张有休整.....	128—129
(九) 对立面的转化.....	129
(十) 死活斗争问题.....	129
(十一) 真理与谬论是对立的, 正确是与 错误斗争中产生的.....	129—130
(十二) 设置对立面.....	130—131
(十三) 设置对立面很重要.....	131
(十四) 听取对立面的意见.....	131
(十五) 研究辩证法的问题.....	131—134
(十六) 对待同志要采取辩证的方法.....	134—136
(十七) 是非关系.....	136—137
(十八) 十个指头的问题.....	138
(十九)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	138—139
(二十) 十个指头的问题.....	139—140
(二十一) 辩证法则是对立与统一的看问题, 所以说是全面的.....	140—141
(二十二) 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	141
(二十三) 片面性有两种.....	141—143
(二十四) 两种片面性.....	143—144

(二十五) 红白喜事问题.....	144—146
(二十六) 对立统一的规律、质变量变的规律、 否定与肯定的规律永远是普遍存在的.....	146—147
(二十七) 两种可能性问题.....	147—149
(二十八) 两种实际可能性.....	149
(二十九) 波浪式的前进是必然的.....	149—150
(三十) 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	150
(三十一) 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	150—151
(三十二) 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	151
✓关于镇反工作和肃反工作的批语.....	152—154
✓对张闻天信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	155
附: 洛甫八月十八日上午庐山临别赠言毛泽东.....	155
✓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	156—166
✓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 (第三版)的笔记(一九六〇年).....	167—247
第一部分(从20章到23章).....	167—195
一、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167—168
二、关于过渡时期.....	168—169
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 共同性和特殊性.....	169—172
四、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	172
五、关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 革命的几个问题.....	173
六、关于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	174—175
七、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问题.....	175
八、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175—176

九、关于中农	176—178
十、关于工农联盟	178—179
十一、关于知識分子的改造	179—180
十二、关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关系	180
十三、关于战争与革命	180—181
十四、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	181—182
十五、大工业是社会主义改造 的基础嗎？	182—183
十六、列宁論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	183
十七、工业化的高速度是个尖銳的問題	183—184
十八、大、中、小并举是为了高速度	184
十九、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可以 长期共存嗎？	184—185
二十、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 只靠机器	185—186
二十一、所謂“彻底巩固”	186—188
二十二、关于战争与和平	188—190
二十三、“一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嗎？	190
二十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 者的权利	190—191
二十五、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是革命？	191—192
二十六、所謂“中国沒有必要采取尖 銳的阶级斗争的形式”	192—193
二十七、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期限	194
二十八、再談工业化和社会主义 改造的关系	194—195

第二部分（从24章到29章）	195—216
二十九、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 力的矛盾	195—196
三十、集体所有制必然要过渡到全民 所有制	196—197
三十一、关于个人财产	197—198
三十二、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 展的动力	198—200
三十三、关于認識的辩证过程	200—201
三十四、关于工会和一长制	201
三十五、从原理原則出发不是馬 列主义的方法	201—202
三十六、先进經驗能毫无阻碍地推广嗎？	202
三十七、关于計划工作	202—204
三十八、关于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长和 工农业并举	204—205
三十九、分配决定論的錯誤观点	205
四十、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	205—206
四十一、关于平衡和不平衡	206—209
四十二、关于所謂“物质刺激”	209—212
四十三、关于社会主义企业中 人与人的关系	212
四十四、关于突击和赶任务	213
四十五、关于价值規律与計划工作	213—215
四十六、关于工资形式	215
四十七、关于价格的两个問題	216

第三部分 (从第30到第34章)	216—224
四十八、关于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	216—218
四十九、先有拖拉机？还是先 有合作化？	218—219
五十、关于“一大二公”	219
五十一、特别强调物质利益的原因 何在？	219—220
五十二、事在人为	220—221
五十三、关于运输和商业	221
五十四、关于工农业并举	222—223
五十五、关于积累水平问题	223—224
第四部分 (从第35章到结束语)	224—237
五十六、关于共产主义的国家问题	224
五十七、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224—225
五十八、集体所有制的发展前途	225—226
五十九、关于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226
六十、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建立 经济体系问题	226—227
六十一、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能够 “拉平”吗？	227—228
六十二、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	228
六十三、关于两个世界经济体系 之间的关系	228
六十四、关于对斯大林的批评	228—230
六十五、对教科书的总的看法	230—233
六十六、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	233—235

六十七、关于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方法	235—236
六十八、哲学要为当前政治服务	236—237
补遗	238—246
一、关于我国工业化问题	238—239
二、关于人的地位和能力	239—240
三、关于依靠群众的问题	240—241
四、关于苏联和我国发展 过程中的一些比较	241—243
五、关于总路线形成和巩固的过程	243—245
六、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 内部矛盾及其他	245—246
七、中国的工业革命为什么能最迅速？	246
✓对供给制的意见	248
✓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 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〇年三月)	249
○关于反华问题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250—252
✓十年总结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	253
✓中央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254—255
✓对聂荣臻副总理关于技术革命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255
✓向高干推荐的经典著作	256
✓教育青年的原则	257
✓《反对本本主义》序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	257

-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258—266
- ✓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一日).....267—268
- ✓給郭沫若的一封信.....268
- ✓在接見日本朋友时的談話(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269
- 在廬山會議上的讲话(續編) 係67-71改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270—276
- 机关枪和迫机炮的来历及其他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277—279
- 編后.....280

給福斯特同志的信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

十分感謝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来信。从您的充滿热情的来信中，使我看到了伟大的美国共产党的灵魂，看到了伟大的美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灵魂。

中国人民懂得，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做了許多坏事，对全世界做了許多坏事，只是美国的統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在美国人中間，虽然有許多人現在还没有觉醒，但是坏人只是一小部分，絕大多数是好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間的友好关系，終究会冲破杜勒斯之流的障碍，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

美国共产党虽然暂时还处在不大順利的地位，但是你們的斗争是很有意义的，将来一定会結出丰硕的果实。黑夜是有尽头的。美国反动势力現已到处碰壁，显示着他們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你們那里目前敌强我弱这种形势，完全是暂时的現象，它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起变化。

請允許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您——美国工人阶级光荣的战士和領袖，致以衷心的問候，并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如果您有可能的話，我热忱地欢迎您到中国来医疗和休养。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

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一个做为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象人民公社这样的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加深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注：此文是二月二十七日下午的讲话中的一段，位于17页上边第六行至二十行。

对新、洛、许、信四个地委

座谈时的谈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和富队，有穷村有富村。你们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采取的什么分配办法？那时候是不是有差别？那时候上交是否相等？穷队富队、穷村富村主要是资源不同、条件不同、管理不同、历史不同，因此，产量也不同，这样就分出了穷队富队、穷村富村。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产，生产多者奖励。就是农业社是不是拉平的？苏联五千万吨钢不能和我们一千多万吨钢拉平，那是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对地主、资本家是可以的，我们过去对地主、资本家是无偿剥夺。因为那不是他们劳动的，那是人民的，是人民的。所以那时候提出土地回老家，鞍钢回老家，那不是剥夺。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同了，因为他是朋友，我们是采取赎买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明明是工人阶级生产的，不是资本家的，因为他是朋友，所以尚采取赎买政策，利用他作工作，团结知识分子，有偿收买剥夺工人的财产。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的，是掠夺，是抢劫。包括桌椅板凳在内都要打条子，打借据。

十年偿还。

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工记分是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一九五六年高级化第一年粮的经验没有记取就发生此问题。老太婆挡住不让拉粮。现在公社第一年又是发生此问题。现在看今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好，值得研究。今年要宣布几条政策，穷的富的都干，想办法帮助穷的，把中国提高到苏联水平。西方国家来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不能把西方国家的砍下来补亚非国家，还是亚非国家自己提高。当然在亚非国家的投资应该收，但是不能去欧洲设机器。也就是说，苏联现在发展的水平，不能白白地送给我们，因为苏联有工人，有工人要开资，机器要搞折旧费，你苏联的砍了给我，你怎么办？还要搞等价交换。（汇报时说，有的就怕商业部门收购猪，猪赶到地里，使猪乱跑，有的是在棉花里）这个办法我赞成。（汇报时反映，有的地里花生没有收净，采取分成的办法以后，有的一夜就收净了）要采取分成的办法。我很赞成千方百计地吃掉、跑掉，这样的办法不是本位主义，这是他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不行。你这实际上是无偿外调，你叫他本位主义，名词搞不对。这是所有制的問題。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

河北省一月八号开党代会，想想想统一，想统死，但决议，但是，到了一月下旬感到不对头，省委赶紧转，开了电话会议，转变了以后，有些地委不通，县委不通，

些公社不通。现在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积累不能超过百分之十八，税收不超过百分之七，合起来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这就占四分之一，生产费百分之二十，群众分配百分之五十五。下边隐瞒，实际不至只分配百分之三十。大家都想多积累一点办工业，这也是好心。斯大林就是这样的政策。斯大林从建国到一九五三年为止的三十年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搞了一个集体化，一个机械化。沙皇时代没有集体化。集体化了，没有机械化。机械化了，但是他死那一年的产量和沙皇时代一样，如果不是××××改变政策，将来越发展越严重。我们现在不改变政策，就要犯斯大林的错误。

我们现在说生产队，队就是社嘛！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应该是有公粮之权，积累之权，产品分配应该在队。（汇报时反映，社办的事太多；一方面投资太多，再一方面劳动力调的太多）要改变这种政策。过去就讲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现在是半盘棋，几亿农民是大半盘棋，光搞国家积累、社里积累不行。过去讲“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现在的百姓就是社，君就是国家。斯大林搞了三十年，是一条腿走路。如果我们百分之七十归国家，和地主一样，群众只得三成。当然我们和地主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我们多积累一点是搞建设，建设反过来还是为人民嘛！这一点也要分析，要讲清楚，他是想迅速工业化，是好心，但是，我叫作好心不是好主意。我们和地主不一样，不是为了发财。我们一时没有讲清楚，八届六中全会也还没有讲清楚，只讲了按劳分配，只讲了生产责任

制，没讲怎么样按劳分配，没有讲清楚集体所有制。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公社所有制要有个过程，现在基本上是队所有制。无非就是这样几条。土地农民不怕，省委、地委、中央你都搬不走，他现在争的是产品和劳动力。我们说土地还是集体所有制，内部搞一个文件说一下，实际是队所有。土地、工具、生产资料加人力和公社只搞百分之二十五，你们考虑是不是太少了？现在反对本位主义，造成紧张局势，越造成紧张局势越紧张。实际瞒的百分之十五叫它合法。我们国家和社积累百分之二十五，生产费百分之二十，群众分配百分之五十五，这个比例不变，生产年年发展，绝对数都增加了。把白菜、把猪都拉走，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一定要改变。

另外，谈谈工业怎么办？工业现在占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正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要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近来个折衷办法，叫他退一半。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把原来的贷款收回来了，他发工资都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先宣布安民布告。调拨要研究个章程。分配也要研究一下。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我们经过四个时代了：互助组，那只有一点集体所有制，初级社集体所有制就多了，叫做半集体所有制，高级社的时候，可以说有十分之七是集体所有制。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

就拥护我们了。农民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这样是否会收不到东西？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要有个过程。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干老子。粮食生产队有个差等，工资也要有个差等。河北省是上死下活，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叫作“死级活评，按劳取酬”。

在郑州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二月、三月)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人民公社決議只提一句“按劳分配”，究竟如何按劳分配，沒有完全解决。什么是生产責任制？馬克思讲过“生产責任制”，怎样的責任制也未讲。現在要談的問題是公社所有制的問題。所有制的問題，即公社所有制要不要一个过渡来建立，是不是公社建立的时候就是集体所有制。我在山东看了一个公社——济南东郊人民公社，二万一千戶，十二万人，一个生产队，距公社所有制很远，实际上是公社党委所有，这还得了！問題就在这里。現在很多人不通，就是要統多統死，就是过去地方讲我們的，現在不是下放了嗎？公社有三級，生产队一級有七、八百戶，有一千多戶的。所謂統多，就是多搞积累。所謂所有制，一曰土地等生产資料，二曰劳动力，三曰劳动产品。这些究竟归誰所有？現在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委包括中央恐怕还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因此要統多統死。現在工人和农民的情况不同，以鞍鋼为例，一个工人的总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剩一万余八百元，工人收入八百元，个人消費占他的产值不足十二分之一，为国家积累很少。我們想积累，河南公社积累、国家稅收、管理費用、公益金共占百分之五十，生产費用占百分之二十，农民实际所得百分之三十。但农民要活，因此要

購产百分之十五，方法几十种，这是合法权力，而我們批評他們为本位主义。其实是违犯按劳付酬的原則。現在所有制实际是队所有制，生产資料，生产者归队所有，产品所有制也归队。农民現在站崗放哨，保卫产品所有制，为他的劳动成果而斗争，你分給他百分之三十，他就加百分之十五，实际上是百分之四十五。現在公社与生产队激烈斗争是两个問題，一是人力，二是产品。农民不怕把土地搬走，但怕把产品运走，农民往城里跑。現在財政部門把全部貸款收回，因此，使人民公社无法維持，这是一种破坏生产、反人民公社的傾向。貸款全部收回的还要退还。买猪买白菜的錢不能給公社，否則白菜大批烂，农村拼命地吃，城里吃不到，原因就在这里，不完全是运输問題。現在頂牛，一方面生产队批評上边是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上边批評下边是本位主义，两种主义可能都有，但是我們在党内主要锋芒还是反左。生产費与积累占百分之七十，消費只占百分之三十，积累太多，猪卖了，各种物資卖了，都是归社，这种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險的政策。不應該批評他購产是本位主义，东西本来是他的，你不給他分，他只好購产私分。所有制的改变，少者四年，多者五、六、七年。富队帮助穷队提高，穷队逐步向富队看齐，不要把富队的头砍下来补給穷队。这种性质是无償占有別人的劳动。我們对民族资产阶级还用贖买的办法。苏联五千五百万吨鋼，我們一千一百万吨鋼，砍苏联二千万吨鋼补給我們不合理。一部分农民无償地占另一部分农民的产品，不叫搶劫，而叫“共产主义风格”。这与救济穷的不同。工业办多了，为什么积累这么多，財政部門为什么把一切貸款都收回，就是办多了工业。中央、省、地、县、

公社都想大办工业，看来各级的积极性过多了些。这点情有可原。情者合乎实际，因为土地、劳力、产品均属他的。中央、省、地、县、公社、管理区六级对付生产队和队，六级有权，但是农民人多。什么是一盘棋？现在不是一盘棋，是半盘棋，分配太少了，不承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只分给人家百分之三十，要拉平分配，这叫作半盘棋，大批人馬調动，大批积累，这种权利是冒险主义的权利，只要共产主义，不要本位主义很危险。要正当地提积累，要正当地办工业，而不是如疯狂地提积累办工业，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本位主义，光要共产主义不行。农民瞒产情有可原，他们的劳动产品应该归他们所有。积累，无代价地修铁路、修公路、修和他們不相干的水庫，这一部分无偿劳动很大。提积累、收貸款、购买东西不给錢，組織運輸力也不給錢，这就是农民想尽办法保卫他的劳动果实的原因。

六中全会对积累問題分配問題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不解决此問題，大跃进就无积极性。现在要出安民告示，现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制，公社和管理区实际是联系介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者之間。不出告示危险，今年庫存有减少，沒有增产。反本位主义越反越收购不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为什么去年秋收那样粗糙？东西收不到？就是沒有解决分配制度問題。河南新乡地委說，收柿子宣布誰收誰得，一夜完。要承认农民瞒产合法，中央与省应說服地、县、社三級党委，社应說服管理区总支。我們站在一边首先支持农民的合法权利，也說明我們无非是想搞工业化。工資級別死級活評，一个月評一次，多劳多得，一月变一次，工資总额不变，又叫上死下活。究

竟公社要統多少？統三大項：国家稅收、公積金、公益金。还有統购、計劃、物价、教育，教育办的过多了也不好。

此外，工业办多了。社办、县办、地办，省未納入国家計劃的工业也多了，要規定，不可不办，不可过多，中央、省、地、县、社五級工业都要有所調整，五級工业都不可太多，現在要繼續把冷水泼下去。要把所有制問題讲清楚，要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我們的政策加以比較，斯大林的积极性太多，对农民竭泽而漁，現在即此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不是反本位主义情有可原，改为合法权利。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了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分配中的消費部分要增加，要发展生产，把穷队逐步提高到富队水平，不要拉平，工业不要办得太多了，采取这种办法积累。搞大型工业、大型水利和公路等要有限制。分配給个人的要增加，超額分成。十条猪完成十一条任务那一个分成。田家英的警卫員是河北人回去看一次，家中杀一条猪六十斤，为什么要杀？等不起，等了要拿走。我看要写个決議案，以所有制为中心，积累問題，分配問題。每个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多寡不一，每个生产队的吃粮标准也应该有差別，有的可能少于三百八十斤，只得如此，粮食多产多吃，工資也是多产多分，死級活評，基本原則是按劳分配。这是消費。积累是建設費用。公社不能办脱离生产的文工团，各級干部太多，要大大精簡，節約办社要在決議里写一条。办工业的积极性，第一要称赞，第二要約束，中央、省、地、县都要約束，要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哪些工业归县归社要有所調整。

我写了几句話。

△、所有制的問題：几年內，譬如說四、五年內逐步完成由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而目前在公社說来，只有部分的所有制，积累公益金等，产品所有也是这样，即“承认生产队的保守主义或本位主义”。这样我們的六級干部就可以和六亿人民打成一片。一方面批評我們的平均主义，一方面批評他們的本位主义。去年秋前好象农民跑向工人之前，但秋后即瞞产私分，这就是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是不是向农民让步的問題？这不是向农民让步問題，这等于按劳分配逐步到按需分配一样。在某一点上說，即对于过于积极办工业是一个让步。公社所有制，只能經過几年的時間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把它当成一个过程去看待。由互助組到高級社經過了四年（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經過了几个步驟才完成，由高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到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經過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時間，譬如五年、六年、七年時間，要整过急的思想。問題是把穷队提高致富队的生产水平，要經過这样一个过程。由于社大队多，所以要有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即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与道德品质的提高，人民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的过程（我們計算四年鋼可到五千万吨，明年拨一百万吨，后年拨二百万吨，大后年拨三百万吨，即六百万吨鋼材装备农业机械化就差不多了，公社工业化有四、五、六、七年就差不多了）。当然，这还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設（即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時間）。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其性

质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是說，从一九五八年算起的，三、四、五、六、七年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人民公社或大部分人民公社轉到全民所有制。一九五八年粮、棉、油、麻等大丰收，但是在最近四月內（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有大鬧粮、油不足的风潮，你說怪不怪，出乎意料之外，世界上天有不测风云。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級党委，大批評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所謂瞞产私分，帽子一頂叫本位主义。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瞞产私分，深藏秘密，站崗放哨，保卫他們自己的产品，翻过来批評公社和上級平均主义，搶产共产，写条一点，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作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有部分的不合理不合法，貪污、多余产品說完成国家征购任务而不完成的）。他們基本上不是所謂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当权利（他产的嗎！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嗎！他懂得点馬克思主义，他們就是按照这个原則来办事的）。这里有两个問題：△、穷富队拉平，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是无償的占用別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反按劳分配的原則。△、国家农村稅收只占农村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左右（如河南）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是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竟占百分之二十六連同稅收百分之七，为百分之三十三，再扣除一九五九年的生产費百分之二十，再加上公益金、公社管理費共計占百分之五十三以上，社員个人所得只有百分之四十七以下，我认为个人所有太少了，不合物质刺激的原則，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

质太少了。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其中有脱产文工团一百八十人之多，晋南的例子。此外还有扎牌楼、导具等浪费。

公社是一九五八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已纠正，还有余波），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有些是正当的归公社），有些是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有的没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用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只是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此外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官、封的劳动成果，而是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收回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过去是同盟者，又拥护改造，还要利用他们工作等等。既然如此，我们为何可以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过去没有对基层干部讲清楚，动不动就要共产。当然，公共积累不是当作消费资料，也不是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的建设资金，国家也是如此，这是对的。不从所有制问题讲道理讲不清楚，他们实际上是把公社当成全民所有制，只设想大集体所有制，不设想生产队所有制。

（二）劳动分配问题：现在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一个是抢产品，一个是抢劳动力。现在土地、人力、产品三者名义上是归公社所有，实际上基本上仍归生产队所有，目前阶段只有部分的东西归公社所有，即社的积累，社办工业，社办工业

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点公益金。所谓社有，如此而已。虽然如此，希望也就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社有大型、中型农业机械，社办电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三、五、七年就可以把现在的这种所有制状况翻过来，即由基本队有部分社有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的所有制。当然还会拖一个一部分个人所有制的尾巴，例如宅旁林木、家禽、家畜、小农具、小工具等，房屋在大规模建筑公共住宅以前，因为是消费性的，当然是私人的。现在农民不怕拉走土地，怕的是拉走人力和产品。要人要钱的积极性大，一压下去五亿农民没有出路，设所抵抗。去年农民拼命抵抗，把产品让它烂掉，甚至破坏。这抵抗的好，使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

劳动分配，现在极为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分配太少，而工业、行政人员和服务行业的人员太多（有的多到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必须坚决的减下来。过去八年只增八百万工人，去年全国新增的工人一千万未算在内（实际上是二千六百万人）。中国从张之洞办工业以来产业工人只有四百万，解放以来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万，即八百万，共一千二百万，而去年一年增了二千六百万，再加上各行各业转过来转过去的四百万，共为三千万，突然增加三千万，一则一喜，一则一忧。上面这三部分人，都有一大批浪费，必须坚决减下来，从事农林牧副渔，否则有危险。据说工业浪费百分之二十，要回农村。服务行业要大减，行政人员只许有千分之几。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生产队与社、县、国家争人力是项严重的问题。

分配问题：分配是讲消费部分本身的分配，生产队大体

上有穷、中、富三等，吃粮、工资标准都应有差别，吃粮也要有差别，和工资一样，队队不同，除征购外，多得多吃，少得少吃，工资实行死级活评，上死下活制度，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有国家、社、队的仓库）、用粮（要有定量）制度，用粮要精打细算。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粮食问题十年也不要说解决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也不要说解决。要大反浪费，生产永远也不能满足浪费的需要，旧的需要解决了，新的需要又发生了。一九五八年积累多了一点，也是好心肠，有鉴于此，应当向群众公开宣布，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不超过百分之十八，连同国税百分之七，总共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以安定人心，提高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春耕。

最后讲一讲下放当社员的问题。各级干部分级分批下放当社员，每年最少三十天，多者四十五天。一部分下厂、下矿当工人，这样我们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紧张局势了。过去历来是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公社，第三是个人，现在我们倒过来，第一是安排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公社的积累，第三是国家的税收。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教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大得多，并且实行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象人民公社这样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说的，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辩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正在整社工作中，按着六中全会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能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作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做，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

來說，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保护的。

現在我來說一点人民公社的問題。我认为人民公社現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說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許多同志所認識，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須迅速地解决，才有利于調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間的关系。

究竟什么样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現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务。再則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鬧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請你們想一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們应当透过这种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认为主要地应当从我們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說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現在有許多人还不認識公社所有制必須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內，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有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他們誤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資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

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們誤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誤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誤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則，否认等价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範圍內，实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农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們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問題。

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決議和六中全会決議所說，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們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們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这是毫无疑問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問題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机会主义的。問題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把三級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級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經濟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時間。目前的問題是必須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問題。在沒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們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

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七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

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认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力，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也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

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

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提倡要在群众中间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象河北省遵化县雞鳴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行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级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

力，不允許浪費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員，凡是多了的，必須減下来；行政人員只允許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許有脫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們必須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方面的工作，同时統筹兼顧。这样，才算真的做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則，所謂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說来，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規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針，一定要反对浪費，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經驗，今后必須严格規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內不要宣传粮食問題“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員，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議各級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員，少則一个月，多則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經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地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們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說的方針和办法，我认为，我們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好地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化运动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已經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們坚决要求繼續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是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賬派所能推翻的。我們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作了很多很好

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績，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問題只是我們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說，在公社所有制問題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問題。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沒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級干部一时沒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說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們向广大群众公开說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時間內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会掌握在我們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們站在一起。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賬派，将会出来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們要告訴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現的时候，对于我們絲毫没有什么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气，在一段時間內，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頂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們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們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的。經過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們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暢，更加充滿干劲。我們一定能够在一九五九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們的。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我們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問題，二是供应問題。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到了这个問題。在天津、郑

州找省委、地委同志談，各地都在解决这个問題。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情有可原，赦你无錯，不給处分。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去年十一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蘿莢，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們的队长領袖作为一方，管理区生产队队长是中間派，动摇于两者之間。就是我們手伸得太长，拿得太多，他們就不得不瞒产私分。不上調粮食，不給予处分，实际上是承认他們有权。从九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錯誤。这个問題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錯誤，农业就不能发展。河南公社生产費百分之二十，积累、稅收百分之五十，农民只分到百分之三十，瞒百分之十五，实际拿百分之四十五。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平均主义就是冒险主义。我們的決議提了按劳分配，至于如何实行，沒有讲，生产責任制提了，如何实行，也沒有讲。誰料到大丰收出粮食問題。今年要出个安民布告，生产多少，征购多少，吃多少。生产队养的猪归誰？卖东西的錢归誰？一盘棋大部分是五亿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員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百分之十八，加上国家稅收百分之七，共百分之二十五。現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就会犯斯大林的錯誤。現在統得太多，公社至少有十統：一統稅收，二統购，三統积累，四統生产費，五統公益金，六統管理費，七統工业，八統文教，九統供給、工資……。我說，本位主义只能是部分的本位主义，不能都戴本位主义的帽子，几亿农民都戴这頂帽子不舒服，要去掉这頂帽子。能完成征购任务而不完成，可以按个本位主义，基本上大部分是基本

权力，不是本位主义。

讲四个問題：一是所有制問題，二是劳动問題，三是分配問題，四是干部下放当社員。

（一）所有制問題。公社集体所有制，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逐步完成由基本上是生产队（即过去的高級社）的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要承认他合法，現在基本上是他們的所有制，公社所有不了，他們就瞒产私分。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即基本队有，部分社有，过去沒有搞清楚。农民有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上次郑州會議前，讲农民觉悟高，大兵团作战，共产主义风格。秋收以后，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應該如此，一下子搞共产主义不可能。有人說，这是向农民让步問題，在某种意义上來說，是向农民让步，但基本上不是让步，而是我們要得太多，把卖猪、卖大白菜的錢交給公社去了，不給生产队。农民怕共产，当然他們就杀猪、吃菜，实际上大批公社的雞都共产了，所以把公雞杀掉，母雞藏了。

現在公社是联邦政府，要由联邦政府逐步过渡到統一政府。变秦始皇就危险，十三年亡国，隋煬帝三十一年灭亡。一不能統一拉平分配，二积累、社办事业不能过多，要有个过渡。現在社办工业太多，社攬的事情太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是农民和生产队，要在农民和生产队上刮羊毛，所以产生对抗，站崗放哨。不要砍富队补穷队，而是要帮助穷队向富队看齐，这就需要時間。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傾冒险主义。手伸得太长，用的劳动力太多，工业办得太多，竭泽而漁，可能影响农业三十年不能发展。所有制只能基本队有；

部分社有，逐步轉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由互助組到高級社，沒有过渡不行。这样做，基本上不是向农民让步的問題，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引导农民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而不能在目前一下子去完成，要办就是违背客观規律，請你自己縮手。由互助組到高級社，經過了四年（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由高級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可能也要經過三、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時間。公社一成立，就完成公社所有制，这种想法是錯誤的。問題是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这样一个过程，所以需要較多的時間。

再一个問題，就是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業等，只能逐步完成，逐步有所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則会犯冒险主义錯誤。扶助穷队向富队看齐，拉苏联二千万吨鋼来补中国，生产者会反对的。这个过程就是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当然，这还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几个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設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社所有制，也即接近全民所有制。在这整个过程中，其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其分配原則还是按劳分配的。但是在各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內，从一九五八年算起，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就完成了。現在是基本上队有，社只是部分所有。假如現在什么都归县，什么都由公社統，就要統翻几亿农民。在三四年、五六年內，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可能有一部分或大部分轉到全民所有制。一九五八年，粮、棉、油、麻大丰收，但是，却在最

近四个月大鬧粮食、油料不足的风潮，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級党委大批評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反本位主义。我走了三个省，覺得是保护正当权力，幸得有此一手，情有可原，或者是初犯，或者是宣传工作沒有赶上），即所謂瞞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則普遍一致瞞产私分，深藏秘窖，站崗放哨，进行反抗，保卫他們的产品；反批評公社同上級的平均主义，搶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和群众的作法基本上是合理的，而且合法的。他們基本上不是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合法的正当权力。因为土地劳力是他們的，劳动成果——产品，也应当是他們的。

这里有两个問題。一是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是由穷队无偿占有別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則的。二是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业总产值百分之七左右，不算太多，农民是贊成的，但是很多公社和县从公社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的积累占百分之二十六，如税收百分之七，共百分之三十三，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是农民对国家的投資。这远不算修铁路、水庫等义务劳动（如修三门峡），以及很低的工资。再扣除一九五九年生产費百分之二十，再加上公益金，管理費，就达百分之五十三以上，社員个人所得只有百分之四十七以下，我认为这个数目太少了。

公社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刮起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其中有猪、雞、鴨无偿归社，还有部分的桌、椅、板凳、鍋、盆、刀子、碗、筷归公共食堂（还能算廢鉄无偿收去），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項“公”，应当加以分析，有些是正确的，如大部分自

留地归社，这是正常的；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如全部的猪、鸡、鸭。这样一来，共产之风就刮起来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曾经无偿剥夺过帝国主义的财产，但只限于德、日、意，英美是打日本的同盟国，并没有剥夺过，其中有些是征用的，有些是挤垮的。我们曾经没收过地主的生产资料，侵犯过地主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粮食、房屋）。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成果；不过拿回来而已，所以不叫侵犯劳动成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采取赎买政策。对富裕农民更要谨慎，我们怎么可以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呢？当然，公共积累不是对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我的基本意思不是给队给农民戴本位主义的帽子，使县社干部不顶牛，而是丢掉包袱，团结一心，讲明道理，不算错误，把政策搞清楚，这是关系到联系几亿农民的小社以上干部的情绪问题。中央、省、地三级比较超然，而且县、社首当其冲，下面是大队、小队和广大群众。我们拿多了一点，也要讲清楚，是好心建设社会主义。主意不好，过分的那一部分，得承认手伸得长，其性质是冒险主义。办法是要开六级干部会议。

讲讲党的历史，我们党中央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委员会，山头很多，一军团三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二方面军二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其他各根据地、白区又各有小山头。在延安曾说，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有可能最后消灭山头，不要骂人家是保守派主义。现在的山头是生产队（过去的穷村、富村）。

公社搞什么？一、拿出几百万吨钢装备农业，七年可以

机械化，二、搞公社工业，三、搞多种经营：林、牧、渔。这些全民性部分，将来是会发展起来的。三、四、五、六年之后这些东西多了，相形之下，队生产的东西就少了。

山东吕鸿宾社先以条子、秤、“帽”子去对付，以后一把钥匙（思想），讲明政策，一个楼梯，双方下楼，用这三个办法去对付。

历来讲国家、集体、个人，实际应该是个人、集体、国家，一盘棋应该先安排五亿农民，安排适当的粮食。

我们党中央逐步建立权力，从前教条主义，强制执行，实际脱离群众，并没有实权，想多统，统不了，把革命统垮。中央有权是一个过程。工业过去统得太死太多，十大关系提出以后，才逐步调整。适当的集中，适当的统一，要逐步，不要希望一步就集中起来。半路中间，怎么来个这样的干老子——公社。工业也要分级管理，才有地方的积极性。反对绝对集中统一，不要乱戴本位主义的帽子。

富队、穷队还有中间的队，吃饭标准、工资标准应该不同。吃粮食四、五、六百斤，工资按劳分配，也允许有多有少。如河南省有富队，按劳能分二百二十元，结果只分给他一百三十元，砍了九十元，这就是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

二、劳动问题。土地、人力、产品，三种东西，现在名义上归公社所有，而实际基本上仍然只能是归生产队（原来合作社）所有，现在（一九五九年以及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只有部分的归公社所有。就是说，社的积累，社办工矿厂的固定和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一批公益金，一批管理费，如此而已，还有一批生产费，还不是过过手而已。这里讲的是人、物，没有讲计划，社的权力还包括统一计划等。雄心

不要太大，不要攬权太多，他們的权力只有这样多，我主张权力只搞这样多，要教会公社书记这样作，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社有大、中、小型的农业机械，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将现在实际所有状况反转过来，由基本上队有，部分的社有，变为基本上社有，部分的队有，就接近于全民所有制了。那时当然还会拖一个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极小部分的宅旁土地、果树、小农具、家畜家禽等，还为个人所有。公社范围有个人所有，有小集体、大集体，而房屋在公共宿舍未大规模建立起来以前，当然是私有的。现在农民一样不怕，二样怕。不怕公社拉走土地，因为知道搬不走。怕的是人力产品随便被人拿走，——共产。农民就叫“共产”，虽然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现在是要人发财，这是争执的问题。

现在劳动力分配极不合理，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力分得太少，工业、服务业、文工团、学校、行政人员分配得太多。一个太少，一个太多。太多的部分必须坚决减下来充实农业。工业方面多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山西有一个公社立即减少了百分之三十。服务业人员要大减，一百个人中十个人的比例太大，有的一个伙夫烧十个人的饭。行政人员只允许千分之几，而不是百分之几。山东历城十二万人的东郊人民公社，只有十三人脱产，十五个管理区每区五人，一百五十四个生产队每队三人脱产（不包括财贸人员）。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业余的还是可以。生产队与社办工业、与县、与国家争人力，石家庄一个公社跑出去一万一千人。争人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重心是把向城里、工业、服务业跑的人赶回来，加强农业战线。

（三）分配问题——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队有三等——穷、中、富。粮食、工资的分配，应该有差别，社办专业队的工资应该统一。工资可以“死级活评”，一月评一次，上死下活。今年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要严格的杜绝浪费，大反浪费。新乡收棉籽，号召谁收谁有，结果一天收光。濮县收花生放假三天，谁收谁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解决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去年丰收，反而用粮不足，去年粮食收得粗糙，主要是分配制度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不动，制度一万年，还是需要的。要分出国库、社库、队库、堂（公共食堂）库，都必须有制度。一般说来，一九五八年公社积累搞多了点，有鉴于此，一九五九年应向群众宣布：公社积累不超过百分之十八，加国家税收百分之七左右，总共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占工农业总收入），以安人心，以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四）于部下放当社员、工人的问题。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生产队当社员，舒同当了九天。每年至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一部分下放到工厂当工人，也是一个月到一个月半月。中央、省、地、县、社、区六级，要讲清楚六级只有几百万人，另一级是几亿农民及其领袖小队长和生产队长，是大多数，这两方面要打成一片。在若干年内基本实行队所有，分期分批作到公社所有。这样一来，就一定可以达到发展生产、改善关系的两大目的。目前的紧张关系是队和社，有点“国际紧张形势”，主要怕共产。一经济，一政治，以便舒舒服服搞生产，两方面下楼梯，区以上干部“左”了一点，生产队小队长一般无罪，我们要向公社党委和小队长讲清楚，帽子只

扣一部分，該卖给国家的不卖，是本位主义，这样就可以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剩下的观潮派、算账派就会孤立起来。

三月十五日开会不变。同意和地委同志和县委同志研究讨论，提出意见。我的意思是松一下，让农民多生产，也就会更愿意多出一些。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善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否定价值法则。赵尔陆和王鹤寿之间也有一个交换关系。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人不吃饭，怎么拉屎拉尿，不拉屎拉尿怎么有饭米，骨头还是归于地球。自然一部和另一部交换，大体上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不吃别的也不行。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十年搞一百亿无利长期贷款，主要支援贫队，一部分购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两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我建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共产党就是反反复复。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去年郑州会议，就少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铜烂铁，无代价献宝。这在战时是可以的，无代价或者很少代价。战勤只给饭吃，不给代价。这也不是长期的，否则也会破坏生产。

今年你们要节制，尽量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

要讲爱国、爱社、爱民、过去河北提过“要管家，种棉花”，我们给它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

东鹿县收棉花，总结了三条：不问来源，不咎既往，现金交易，谁卖谁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另加一条政治挂帅，敲锣打鼓。

每个公社组织一个专业运输队，改良工具，从现有工业战线抽一批人下来，至于运输队的大小，按照需要。省、专、县商业部门都要组织运输队。

劳动各方面要有一个平衡。要达到一个目的，各方面的平衡：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工业还要细分：有国办、地方办，都搞社办，很不方便，比如修配、磨粉。养猪

都由社养不好，大部都应由生产队、食堂养。

共产主义是不是推迟了？早已推迟了，六中全会决议讲了十年到二十年，还有五个条件没有完成。现在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想早一点，我看越想快搞越搞不成，越慢一点，越可以快。用“无偿”来搞共产主义不行。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了。凡是劳动总是要等价交换的。

积累百分之十八不低，应该有个幅度。

过去一盘棋强调上面，现在一盘棋，要上下兼顾。

专业队归哪个搞？几级都要有专业队。逐步考虑得利大的采取国营，搞全民所有制，比如在东湖打鱼，收入特别多的县可以搞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县可以搞个把，不成功不登报。

穷队向富队看齐，把穷队提高到富队。要使社办工业、企业都办起来，提高公社的基本所有制，房屋不是不建了，要经济、美观、适用。

我看要使社干部不怕，把观潮派搞出来，让地、富、反、坏、观潮派攻，无非是我们一平、二调、三提款。

发工资的问题，可能有发不起工资的情况。

公社所有制，包括三级所有制，三级管理，各计盈亏。

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安国文件值得注意，往年闹粮，主要是富裕中农带头，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提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粮，卖粮之后钱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了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

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揣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

河南会议鸣放的文件，可以发给各地看，开头二、三天不要发，让他们思想混乱几天。到四、五天之后批发给他们看，其中有些内容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六中全会的具体化和发展补充。

山西文件的精神，是管理区和管理区之间，允许有不同的差别。而不过早地消灭这种差别，正是为了从发展生产中消灭这种差别。现在允许它，正是为了将来消灭它。人民公社发展生产提高积累，应当对落后社有适当的照顾。但是如果工资标准上一下拉平，就会减少较多生产水平的管理区的收入，就会减少积累，就会使落后的管理区不注意经济核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行，不是照顾富社，而是照顾穷社，暂时保存这种差别，才有利于增加公社积累，有利于穷、富社都发挥积极性。公社的积累增长得越快，这种差别的消灭也会越快。问题是把穷队向富队看齐，问题是公共积累增多。两方面一来，就会使生产发展得越快。然而由于管理区之间管理工作好坏和生产水平不同，这种差别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对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自然条件和主观努力，千差万别。地球的中心、外部温度就不同。消灭差别的过程，也是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也是机械化、电气化的过程，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公社与队的所有制，互相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过渡，有些队可以先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明年一百万吨钢，后年二百万吨钢，也许多一点供应农

业搞机械化。

錢的補貼确定十亿，作为农业投資。

工資由公社确定，由管理区发。

公社的权力究竟統几个什么东西，开一个賬。这不是公社权力小，而是包而不办。

各省、地、县搞一个示范章程，每个省集中搞一个。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时间，一个礼拜就行了。又要实际，又要超产，无非是一些要点、关节。麻雀这样多，只能如此，但是全无印象也不好。

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是則是，非則非，是本位主义的还是要反，还是要事先訂条約，要政治挂帅，共产主义教育是必要的。貧、中、富队各定多少，国家、集体、个人，全面安排，三者兼顧，个人首先照顾集体、国家，国家首先照顾个人。应该批評本位主义，但是要先批評我們自己的缺点，然后引起积极分子来自我批評，发动多数人自我批評，孤立那些真正本位而不自我批評的人和貪污的人，貪污結合整社来搞，推迟一点，先把积极性搞起来。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沒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戶、穷队、穷社的办法，解决穷社、穷队、穷戶的問題。一是貸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十亿解决这一問題。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个問題。

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說，他們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現象。

河南會議鳴放的文件，可以发給各地看，开头二、三天不要发，让他們思想混乱几天。到四、五天之后批发給他們看，其中有些內容可以解决他們的問題。

这次會議是六中全会的具体化和发展补充。

山西文件的精神，是管理区和管理区之間，允許有不同的差別。而不过早地消灭这种差別，正是为了从发展生产中消灭这种差別。現在允許它，正是为了将来消灭它。人民公社发展生产提高积累，应当对落后社有适当的照顾。但是如果工資标准上一下拉平，就会减少較多生产水平的管理区的收入，就会减少积累，就会使落后的管理区不注意經濟核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行，不是照顾富社，而是照顾穷社，暂时保存这种差別，才有利于增加公社积累，有利于穷、富社都发挥积极性。公社的积累增长得越快，这种差別的消灭也会越快。問題是把穷队向富队看齐，問題是公共积累增多。两方面一来，就会使生产发展得越快。然而由于管理区之間管理工作好坏和生产水平不同，这种差別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对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自然条件和主观努力，千差万别。地球的中心、外部溫度就不同。消灭差別的过程，也是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也是机械化、电气化的过程，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公社与队的所有制，互相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过渡，有些队可以先轉变为全民所有制。

明年一百万吨鋼，后年二百万吨鋼，也許多一点供应农

业搞机械化。

錢的補貼确定十亿，作为农业投資。

工資由公社确定，由管理区发。

公社的权力究竟統几个什么东西，开一个賬。这不是公社权力小，而是包而不办。

各省、地、县搞一个示范章程，每个省集中搞一个。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时间，一个礼拜就行了。又要实际，又要超产，无非是一些要点、关节。麻雀这样多，只能如此，但是全无印象也不好。

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是則是，非則非，是本位主义的还是要反，还是要事先訂条約，要政治挂帅，共产主义教育是必要的。貧、中、富队各定多少，国家、集体、个人，全面安排，三者兼顧，个人首先照顾集体、国家，国家首先照顾个人。应该批評本位主义，但是要先批評我們自己的缺点，然后引起积极分子来自我批評，发动多数人自我批評，孤立那些真正本位而不自我批評的人和貪污的人，貪污結合整社来搞，推迟一点，先把积极性搞起来。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沒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戶、穷队、穷社的办法，解决穷社、穷队、穷戶的問題。一是貸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十亿解决这一問題。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个問題。

共产主义沒有飯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搶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謂之賊，紅帮为搶，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搶，搶和偷科学名詞叫做无偿占有別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經濟剝削，資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們不是要推翻地主資本家嗎？富队里有富人，吃飯不要錢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問題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調、三提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則和等价交換，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就是不等价交換，剝削他們，那时不等价还出一点价，現在一点价也不給，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軍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錢，公社拦腰就搶。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們的政治水平哪里去了？問題是省、地、县委沒有教育他們。整社三个月沒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會議时，不感到这个問題，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二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內部参考中的材料，你們看到沒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鑄的辮子也抓到了，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談話对我很有启发，河北一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傾向于一日公，二日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問題，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問題。到山东談了吕鴻宾合作社，丑条子調东西調不动，就让許多人拿称去称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經战，一頂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信农民就看出你沒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經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把称，一頂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問題，但也沒有接

触到所有制。河南說“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調”，安徽說“錯是錯了，但不算錯”。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換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們上級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調、三提款”，一张条子，一把称，一頂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轉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哪里有錢就往哪里跑。你不等价交換，人家人財两空，吕鴻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們，就是解决所有制問題。

土地属誰所有，劳动力属誰所有，产品就属誰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搶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換，就叫沒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搶？沒有錢嘛！不是搶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現在什么公？猪、鴨、雞、蘿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調，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鴻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現在要解决根本問題——所有制問題。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級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所有人、土、財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員。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問

題。在批轉赵紫阳的报告时，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錢，中央雇工是拿錢的，购粮、油是拿錢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調了些入，調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得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們有經驗，你們过去不是鬧中央統死統多嗎？現在你們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記了。現在中央已經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說了不信，拿出一张表来你們才放心。現在你們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調、三提款”；調，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給資本家，而是出卖給中央、省、县、公社，但要等价交換。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們叫增加工資，他們叫涨价，那是一九二一年的事，到現在三十八年了，我們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嗎？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轉过来，放一炮，瞞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諸公政策錯誤的結果。上千万队长級的干部很坚决，几万社員拥护他們的領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瞞产私分。我們許多政策引起他們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們领导是沒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鍋、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鬧鋼鐵，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沒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級干部、五亿农民說話，坚持搞右傾机会主义，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来貫徹，我一个人貫徹，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馬克思那里告

状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象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铜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要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吸空气一分钟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碳，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出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不给他交换焦炭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是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认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碼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十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四年，六〇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做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达的办

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谷草”，无代价抢掠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上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洲、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火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汗，伊拉克七月十四日革命成功，美国十五日占领黎巴嫩。我们八月二十三日打炮，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的一次集中。他的战争的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三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十二海里，他只承认三海里。我警告三十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帐，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三十几笔帐，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十个指头按一个跳蚤，美国是十个指头按一百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美国统治时，后来有人建议打草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掠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

只能等价交换，三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創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作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們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馬光的办法了。司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是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的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

你們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提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們觉得消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百分之七十。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还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人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

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百分之三十，瞒产私分百分之十五，共百分之四十五，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分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十八），国家税收（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東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副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六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雞鳴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二十三人，三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的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

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十亿人民币，三亿交公社，七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欵不发錢，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們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一方面军有两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們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認識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綱領，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茨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欵差大臣。批評人家是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說敢强我弱，不准說泄气話，只能讲壮气的話，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茨基，反复几次，赫魯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員，我們对待教条主义，采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針。七大之前七中全会決議，会前搞清問題，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錯誤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都信任他們。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認識，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不好，大多数会超过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

年一年增多，将来可以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的队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們沒有分析，武汉时沒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謝謝几亿农民瞞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問題。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問題，这是客观法則，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們不能真正說服他們，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給部分要少，工資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試除外）。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調人，調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六級干部会。有人說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嗎？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現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現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現在我贊成跑，这样可以使我們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已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經驗，然后到武汉去，你們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全会缺少三級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認識問題。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去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謂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綜合阶段。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五亿人口，千万个干部（队长、會計），得罪他們不得了。过去七十万个小社，一社五十个干部，則是三千万干部。瞞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五亿农民支持他們。我們則脱离了群众，認識到这个問題，時間有五个月之久，相当迟，客观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們可以照办。

里面供給和工資問題沒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錢問題，中心是說服公社，不能拦路搶劫。軍官寄錢回去，公社扣了，軍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力必須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設得快。要說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換。邵大哥三枝鋼笔，将来不止三枝，共产主义可能有十枝。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說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經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車、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軍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腸，不輸出，自己吃，这是馬列主义，沒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搶劫，不等价交換。一平二調三提款，不是馬列主义，违反客观規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誤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誤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誤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而慢。武昌會議时，价值法則，等价交換，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城市公社問題，①小城市可以搞；②中等城市沒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子解散，可以試办；③大城市不搞。

一九五九年三月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集中表現。

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要不要一条綫？还是要一条綫的。斯大林同志划了一条綫，指出三个条件，先决条件，这

是对的，缺点讲得不太具体，四十条中提的就比較具体了。許多問題斯大林沒有提到：并举、全党全民办工业、群众运动、政治挂帅、整风。

城市人民公社問題很复杂，不要怕慢，但要采取积极态度。

对农民問題：大跃进时对农民的积极性估計不足，大跃进以来仍是农民問題，过高的估計了农民。究竟鞍鋼是老大哥呢？还是徐水是老大哥呢？还是工人阶级，鞍鋼是老大哥。有些“理論家”一遇到实际問題就打折扣，他們就回避资本主义留下的东西：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問題在于怎么認識，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設有沒有好处，有好处就利用，为我们服务。要利用商品生产、价值規律。

过早宣传全民所有，国家就要調拨，实质上是剥夺了农民，农民会不高兴的，誰高兴这样做呢？台湾，唯恐天下不乱。

公社也可以办赢利較多的工业。（斯大林不敢把拖拉机交給农业社）

有人把农民当成工人，这不对。

不要怕商品生产，問題要看同什么样的經濟相联系。

不能把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父子关系，而是平等关系。破除不平等，但仍然要有差別。

鋼鉄、煤、机械、电很重要。林业很重要，也要成为根本問題之一。

价值法則不起調节作用，只是計算工具。

人民公社实现了全民所有制不算共产主义。

苦战三年，再过十二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

对《陶魯笈关于五級干部會議情况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

旧帳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不对，应改为旧帳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四月)

⊙ 多謀善斷。这句话重点在謀字上，要多謀，不謀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要反对少謀武断。多謀，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的人謀得多，与相反意见的人謀得少，与干部謀得多，与生产人员謀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謀是基础，只有多謀，才能善断。多謀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謀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有些同志少謀武断是要不得的。

⊙ 留有余地。这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需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二千斤，这就是没有给下面留有余地，也是没有给上面留有余地。过去我们打仗留预备队，现在搞生产就忘掉了。经济工作不能蛮打蛮攻，生产工作不能都停掉。计划工作就要留余地。保证重点是主要的，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是按政策办事情的。

⊙ 波浪式前进。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波浪式前进，这是运动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都是由点到面，由小到大，都是波浪式前进的，不是直线上升。

(四) 要善于观察形势。要经常注意政治动态、经济动态。所谓政治动态，就是观察各阶级的思想，观察他们的立场变化，书记要观察，各委员也要观察。各委员不但要做好分管的工作，也要做好集体的工作。

(五) 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基本建设摊子大了一些，就要缩短一些。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六) 与人通气。上下左右、左邻右舍，上上下下都要通气。中央与地方商量通气，党委委员互相商量通气，与书记要通气。我们过去通气少了一些，要想办法通气。现在采取了写信的方法。一个月写一次，这是通气的方法。不要满足于书记处办事，更不要对省委书记封锁消息。

(七) 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说：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和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有缺点要改进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过去朝廷有廷杖的制度，不知打死多少人，但还有很多人冒死去反朝廷。

(八) 要集中。集中在书记处、常委会，要少数服从多数，但党内一定要造成一种空气，精神要解放，批评要开展，批评就是同志式的帮助。

(九)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不要拿出来，拿出来也要顶回去。写文件要通俗，要有口语，要有目的性，观点要明朗，讲话要看对象。鲁迅的《阿Q正传》，写了很多通俗话。

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这几个月，从去年八月起，现在是四月，这八个月里头出了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去年八月大闹台湾，现在大闹西藏。我们就是这两块地方没有改革。西藏是陆地，有公路，可以用车子走。西藏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跟它订立台湾那样的条约的，我们空军可以去，陆军也可以去。而台湾的性质就不同了，台湾跟美国人订了条约。去年美国人在中东闹得混不下，中东事件，搞得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以及那许多美国人都神魂不安，睡不着觉。联合国通过叫他撤兵的第三天，我们就打炮。那里告一段落，这里就跟着来，美国人也就跟着来，吓得屁滚尿流。从美国西海岸调兵，还从地中海调一个舰队到台湾海峡集中。一时候他摸不到我们的底。杜勒斯后来讲，这是他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中，在一个地点集中这么多。比如，单是航空母舰，美国一共有十二条，这回集中了六条，集中了一半。其它的军舰很多。拼命调，生怕我们把金门、马祖、台湾夺回来。蒋介石那个时候慌得一塌糊涂，就准备搬家，有一个经济部确实搬到乡下去了。八月二十三日一打炮，当天(或者是第二天)美国就下决心调兵。这是八月，九月一个月，到了十月，他就看清了，马上撤回去了，回西海

岸，回日本，回菲律宾。地中海的，因为路远，刚刚调来，刚刚到，到马尼拉修理修理，马上又回去。手忙脚乱。结果就是十一月四日美国的选举，共和党失败，民主党胜利了。无代价的作了义务劳动，帮助了民主党。美国人历来欺侮我们，在中东事件以前，他公开发表一个备忘录，说中国之坏，坏得透顶，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搞出许多理论和根据。他又断绝日内瓦的谈判。那好，我们就限个期限来谈。后来到了中东事件的末尾，他东西来了，他比我们那个期限推迟了几天。我们的期限是十五，他十七号回的信，要谈判。我们没有发表，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在乎你那个东西，我们要打炮了，我就不发表那个东西。头一天我们打了一万九千发，赵家驷(他的参谋长)就是这个时候打死的，另外还有一个副司令员吉星文也打死了，俞大维身上也染了一点血。我们祖国的土地，我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旧小说里头有一个“狂生夜坐”的故事，说有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在窗口那个地方伸出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来把自己的脸画成一个张飞样子，(笑声)画得象我们现在的袁世海那个样子，然后也把个舌头伸出来，(笑声)没有那么长就是了，(笑声)两个人就这样顶着，(笑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走了。(笑声)《聊斋志异》的作法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了以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这次会议是个大团结的会议，是一个决定方针政策的会

議。我們要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為什麼一些右派分子能進來加入我們的領導機構呢？世界上就有左、中、右，你只有左、中而無右，就不完全。你說批評了共產黨一頓，搞了個猖狂進攻，就不要人家了。人家現在不進攻了，他猖狂一會不猖狂了，或是暗中猖狂，心中猖狂，不表面化了，也行。比如章乃器這位先生，以及章羅聯盟這些人，他那個心也許是六十年以後，在六十年以內難化的。有這麼少數人，我說也可以，章乃器是民建的，羅是民盟的，你們大概都是嫌得他們要死了，不想要他了，我說還是要，要為好。馬克思主義對宇宙的觀察，第一個概念，宇宙是統一的，不是各自孤立的。但是宇宙又是多樣性的。你看動物中間，又有人類，又有狗類、牛類、羊類，這都是高級動物，這是胎生動物。還有卵生動物，比如雞、鳥、魚，這還算脊椎動物。此外還有軟體動物。你看，動物就這樣複雜。至於講到生物，那還有植物。植物當中還有低級的植物，比如微生物。世界上有各種各樣，人有階級之分。在我們這裡，是逐步消滅階級，這也不能性急，要慢慢來。文武之道，一張一弛，老是整風，可是受不了，不要老那麼整，整得厭煩了。怎麼辦？停一年兩年，三年都可以。你厭煩，我就不整。你不厭煩，你就整自己，大家幫助一下。當然，不是一點批評也不要，一團和氣，但大体上那個緊張局勢要緩和一下。先生同學生的關係要緩和一下，先生還是先生，學生還是學生。先生為什麼叫先生呢？他就是多了幾歲年紀，多了一點學問，這就叫先生，先生有不如學生的，弟子未必不如師，師未必賢於弟子，這也是真的。但是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先生聞道早一點，他這個業務專門一點。老是那麼批評

先生，先生教書教不下了，那也不好。還是要尊師重道。同時學生要幫助先生，因為學生是青年，耳聰目明。各民主黨派內部的關係，各民主黨派與社會的關係，各黨之間的相互關係，我看現在這個氣候還（不）是一九五七年那個氣候了。那個時候許多人不自覺，現在這個自覺提高得多了。我們不是一棍子打死人的辦法，要留有余地。

关于工作方法十六条

(一九五九年五月)

党的总路线，大家都赞成，去年政治上主要的标志是总路线的制定，但是，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工作方法问题，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

关于工作方法问题，主要讲十六条。

一、多谋善断

有些同志少谋差断或少谋轻断。所谓多谋就是要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听取下级、秘书、左右的意见，听取厂长、工人、农民的意见。而且要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然后再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加以分析，作出判断。

二、留有余地

俗话讲的要留有后手，工作中要有机动，过去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在战役上要多于敌人几倍兵力，消灭敌人，不打无准备的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搞计划也应留有余地。长短期计划，都应如此，要让实际工作去超过，要给群众超过计划的余地。计划定高了，不仅超额不了，而且原来指标达不到，生产队长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过去在工作中间起碼是个洩劲的办法。让群众超过反而会鼓舞群众的干

的。同时又要保证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文艺工作也是如此，戏要使观众看了以后要有回味和议论的余地。如果你看了前半场就知道后半场是什么，那就没有意思。说话不要把话说绝了。

三、波浪式的前进

一九五七年反冒进，出现了马鞍形，但是，一九五七年不得不把指标降下来，工作中应该波浪式的前进。今年也稍微降低了些。按速度来看，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今年要确保一千六百五十万吨钢，煤有信心完成。农业指标，粮棉要很大努力才能完成，明年数字稍微再低一些，一九六一年再来个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对波浪式前进，反对冒进。

四、实事求是

要落实计划，要按照形势改变计划，形势变了，人的思想也要跟着变，不跟着形势改变计划，工作就被动。脑子不要僵化，订计划要有多少材料，多少人，不要主观主义的订计划。

五、要善于观察形势

脑子不要僵化，要提倡嗅一嗅政治形势，嗅一嗅人们思想动态，嗅一嗅经济形势。北戴河会议时，指标订得高，后来我去了河北、山东感到不行，六中全会决定降低为二千万，上海会议又压低了一下，一步步落实。

六、要当机立断

只有观察形势，才能当机立断。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工作中也有断，但断的不适当。优柔寡断是不对的。断的时候定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公社这个问题很明显，究竟几级管理，去年没搞清楚。再经过一个过程，一月二十七日，就老啃这个问题，后来看了赵紫阳同志的报告，又到天津找了刘子厚，到了山东找了谭启龙，到了吕鸿宾社，发现了以下问题：一根条子，一杆称，不同意的一顶帽子，一把钥匙，一张布告，一个楼梯。从这时才发觉队的所有制。这次会议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些同志十分怕上级，十分怕下级，以后要来一个上级、下级夹攻中层。

七、与人通气

开工作会议，不要一点空气没有，讨论之前应该事先有个酝酿，有些会连题目也没有。我讲这个问题，讲了一百次，不通气不好，不要把问题独立起来，不要使人不摸底，决定问题，要有个充分的酝酿。

八、要能解除封锁线

报告中要有观点，一个事情要提出几种方案，要说明你那里基本情况，不同意见，核心问题是什么，要把工作情况如实反映上来，不要封锁。

九、一个人有时会胜于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

列宁说过，要有反潮流的勇气，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要把心里（话）说出来。有些同志深怕对自己不利，这就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十、要历史地看问题

计划变动，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去年是大跃进。增产速度达到百分之十是跃进，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百分之三十就是持续大跃进。

十一、写文章要国语化，不要半

文半白，半古半今，要提

倡国语化，要交待清楚

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公报，就有个来龙去脉，写文章要以全党全民为对象。有些文章没有说服力，说明你对业务本身不了解，不认识、不了解群众心理。唐朝名作家韩愈，以散文著名于世，他是河南修武人，他主张用师之意，不用师之词，他主张不要因循守旧，要有独特风格，不要把毁誉。潘宗词写駢体文，不好读，专叫人看不懂。

十二、要负起责任来

有权在手，就可以把令下，要勇于负责，要服从领导。

十三、要解放思想

不要怕鬼，不要扭扭捏捏，要有骨有肉，有些同志中空气不健全，思想没解放，怕挨整，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人物都不如。怕什么，无非是六大条

目：撤职、降级、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牢、杀头。

十四、关于批评

我们都是好同志，对同志的批评也是为了把工作作好，无非找到好的工作方法。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恨，就是不可设想的。批评、自我批评是党教育人民的武器。我们前代无冤，后代无仇，痛苦可以使人进步。

十五、集体领导

中央开会有了核心，各地都应办到。

十六、和各部的联系

特别是和工业部门的联系要加强，和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两部（冶金、一机）的联系要密切。

（註：非正式文件，仅作参考）

几个重要指示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

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该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各级的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的书。要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在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得好，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一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有系统地编一本书。

*

*

*

国内形势如何？总的说来，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基本问题是：

- 1、综合平衡，
- 2、群众路线，
- 3、统一领导，
- 4、注意质量。

其中最主要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问题。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

麻、絲、烟、茶、糖、菜、菓、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輕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集中力量搞小高炉，其他都丢了，这样搞法不行。

大跃进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点是沒有平衡。說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沒有兼顧。整个經濟中，綜合平衡是个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綫。

三种平衡：

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漁；

工业内部的各个部門，各个环节；

工业和农业。

做好这三种平衡工作，才可能正确地处理整个国民經济的比例关系。

过去安排經濟计划的順序是重、輕、农，今后恐怕要倒过来。現在是否农、輕、重呢？也就是說，要強調把农业搞好，要把重、輕、农、商、交的順序改为农、輕、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資料，并不违反馬克思主义。过去陈云同志說过：要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贊成。現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見是对的。要先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問題。这五个字安排好了之后，让大家过得舒服。就是有人說閑話，罵我們。这样有利于建設，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

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銷，群众要求恢复，看来非恢复不可，可以三年不变。如果可以定，究竟定多少，增产

部分是否可以征四留六，有災減，自留地不征稅，这次會議要說一下。

要恢复农村初級市場。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紅軍的三大紀律有两条可以普遍用：“一切行动听指揮”，就是要統一領導，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針一錢”，就是不搞一平，二調。

体制問題，現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應該強調一下統一領導，中央集权。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对下要适当控制，反对半无政府主义。

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現在看来，不可过活。

关于总路綫的談話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

对形势的認識不一致，就不能团結。要党内团結，首先要把問題搞清楚，要思想統一。

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們認識，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

要把問題搞清楚，有人說总路綫根本不对。所謂总路綫，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錯。

我們也把道理讲清楚，把問題摆开，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綫下面。

要承认缺点、錯誤，从一个局部来讲，从一个問題来讲，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是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是从全局来讲，只是一个指头的問題。从总的形势来讲，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說，請他們隔十年時間再来看看我們是否正确。因为总路綫的正确与否，是实践的問題，要有时間，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們对建設應該說还没有經驗，至少还要十年。这一年来的會議，我們总是把問題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錯誤。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們說明。从某些具体事实看来，确实有得不償失的，但是总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是要付学費的。

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你們讲了那么多，允許我讲点把钟点，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讲点这样的意見。我看了同志們的記錄、发言、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談了話，我感到有两种傾向，这里讲一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吳稚暉說，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让人家讲坏話，只愿人家讲好話、不愿听坏話，我劝这些同志要听。話有三种，咀有两用。人有一个咀巴，一日吃飯，二日講話之义务。长一对耳朵，能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人就是不爱听坏話。好坏都要听。話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

現在党内外夹攻我們。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一部分意見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問題，挨过批評，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軍区的材料。这些話都是会外的講話，我們是党内会外結合，可惜庐山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来，象江西

党校，罗隆基、陈铭枢。这是江西人的责任，房子太小么！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好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么！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堕落，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春节前后，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的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多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看了。唐僧取经，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样说，是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

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的吃，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不行。林×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及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即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也可以，不愿意的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能退的退，社与队的帐算清楚了。这一个月的算帐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那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地剥削人家的劳动，破坏等价交换。拿的是土豪劣绅的，

那个章程我看是可以的。宋江劫的是“生辰綱”，就是我們的打土豪，劫的是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劫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到农民。我們已长期不打土豪。打土豪，分田地，归公那也可以，因为那也是不义之财。我們刮“共产风”，取生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来就走，这样是錯誤的。我們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們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信有历史材料为证。三、四月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了教育，讲清了，他們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沒有讀好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說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懂，叫他們讀懂，公社一級不懂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識字可以讲，通几分，可以不讀書，用事实来教育。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发之，一字不識，强迫他做詩，他口讀，叫別人写。他說有些讀書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我不是反对扫文盲。柯老說，全民进大学，我也贊成，不过十五年得延长。还有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將軍，打了仗以后要作詩：“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問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解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籠盖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风吹草低見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識的人。一字不識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們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讲讲，政治经济学不識字可以讲，讲讲就懂了。他們比知識分子容易懂，教科书我就沒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

間，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們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會議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級會議，影响五級會議都要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就听不进去，我們检查多次，你們就沒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咀巴么！要人家讲么！要听人家的意見，我看这次會議有些問題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棄自己的观点，无非抱着叻！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話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說就是硬着头皮頂住啊！无非是罵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听到坏話就一股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頂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們要听，你們贊成不贊成是你們的事，不贊成如我錯我作自我批評。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搖。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搖的。

对于一封信的評論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們的經濟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績方面的材料，可以說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缺点、錯誤是主流，因此作出結論說，党犯了“冒險主义”、“机会主义”錯誤，而其根源則是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沒有“同时”反对左傾冒險主义的危險。作者李云仲同志的基本观点，是錯誤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陣，大炼鋼鐵損失很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对基本建設也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傾冒險主义”、“机会主义”錯誤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沒有好評，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論”者，某些地方簡直是“有失无得論”者，作者对这些結論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們看見的另一些同志，他們对党 and 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滿，对成績估計很不足，对缺点估計过高，为現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励，而是洩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

愿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囁嚅”，躲躲閃閃的态度大不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隱蔽自己的观点，他滿腔热情地写信給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時間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缺点的批評，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来，还没有一个建議和敢于向中央中肯的有分析的系統的揭露我們计划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沒有看見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們就是不敢，也难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議將此信在中央一級和地方一級(省、市、自治区)共兩級的党組織中，特別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討論，并且展开辯論，將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自己所作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統一認識，團結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爭取經濟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軍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級組織的領導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會議以来，到此庐山會議，对于在自己領導下的各項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錯誤、缺点，在足够的估計成績(成績是主要的，缺点、錯誤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工作已經有几个月了。必須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見效和逐步地見效的，又必須看到，这种严肃认真地批判，必定而且已經帶來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洩气。錯誤必須批判，洩气必須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洩，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們必須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會議記錄上所說的，在滿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

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錯誤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錯誤。錯誤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評，不肯改正，又怕因批評而洩了气。必須做到改錯与鼓励两个方面，必須看到批評整改虽然已經进行九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作完不可留下尾巴。但是，現在党内外出現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动已經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現在此會議印发各同志的許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沒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造勢已經很显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綫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階級性质。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階級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們和我們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們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的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們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們的情緒有些不正常，他們把党犯的錯誤估計的过大了一些，而把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創造出来的伟大成績則估計得过小了一些，他們作出了不适当的結論，他們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們把他們的位置不自覺的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間，他們是典型的中間派，他們是得失相当論者，他們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搖搖擺擺。我們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搖擺，因为这种同志的搖擺，不利于当前人民的团結，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爭取胜利。我們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們的任务是团結他們，爭取他們改变态度。为要达此目的，必須对党內此种动态作必要的估計，不可估計太高，认为他們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搖翻，他們沒有这样大的力量，他們只占相对的少数，而我們則占大多数，我們和人民中的大多数

(工人、貧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革命知識分子)是团結一致的，党的总路綫和体现总路綫的方針、政策、工作方法 是受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們的力量估計过低，他們有相当一些人，他們的錯誤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輕易放棄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須看到。党内遇到大問題有爭論，表現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搖擺，站在中間，有些人站在右边去，是正常的現象，无需大惊小怪。归根結底，錯誤观点乃至錯誤路綫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搖擺甚至犯路綫錯誤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結起来。我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結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現在这一次爭論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爭論，如同我們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爭論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不可能是沒有爭論，风平浪靜的，庐山會議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會議。团結——批評——团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是我們解决党内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 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們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見，大体已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會議上讲了，但有些沒讲完，作为那次講話的补充。就写了这些话。

关于三个文件的按語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此三件印发各同志。印时注意，将赫魯晓夫的那篇（連同中央社的一則紐約消息）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請同志們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經垮台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話，有那些是以使它垮台的因素，如果不垮台的話，又是因为什么。不为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請同志們看一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們就是指出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則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們，你們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嗎？

給 王 稼 祥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

稼祥同志：此件請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魯晓夫們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們是处于被动的了，我們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給張聞天的信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

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是按的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做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疾病厚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发症了。昔人詠疟症词云：“冷来时冷的在冷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的无灵破，颠时节颠的牙关挫。只被们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无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忽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讀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果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笔，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

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忙，请待日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

中委、候补中委一百九十一人，到会一百四十七人，列席十五人，共一百六十二人开会。

會議議程：

一、改指标問題。武汉六中全会决定了今年的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有人主张改指标，多数不同意，看来改也改不彻底，现在还有五个月，改了好。经过人大常委会。高指标是自己立一个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打破，打破不符合实际的指标，鋼、煤、粮、棉等。

二、路綫問題。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上庐山前不清楚，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說不敢講話，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說的不民主是什么？前半个月是神仙會議，沒有紧张局势。他們說沒有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綫，破坏总路綫；說要自由，就是破坏总路綫的自由，要批評总路綫的言論自由。他們要求紧张的形势，以批評去年为主，也批評今年的工作。說去年工作都做坏了。自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會議以来，糾正了刮“共产风”，糾正了“一平二調三提款”等一些“左”的傾向。他們对于九个月来的工作，看不到，不滿意，要求重新通过，否則就认为是压制民主。他們对政治局扩大會議不过

癮，說民主了，現在开全会，民主大些。准备明年春开党代表大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五七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鳴、大放、大辯論嗎？庐山會議已經开了一个月了，新来的同志不知道怎么回事，先开几天小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出決議。

开会的方法，用大家所贊成的方法，从团結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的团結，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在我們看来，我們應該团結。現在有一种分裂的傾向，去年八大我說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的分裂。当时还没有显著的跡象，現在有这种跡象了。团結的方法，从团結的愿望出发，經過批評与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結的目的。对犯錯誤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給犯錯誤的同志一条出路，允許犯錯誤的人改正錯誤，繼續革命，不要象《阿Q正传》上的赵太爷不許阿Q革命。对犯錯誤的同志要一看，二帮，只看不帮，不做工作是不好的。我們反对錯誤，毒药吃不得，我們不是欣尝錯誤的臭味，批評斗争是为了讓他們离我們近一点，使缺点錯誤离我們越远越好。对于犯錯誤的同志要有分析，无非是两种可能：一个是能改，一个是不能改。所謂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謂帮，就是帮他改。有些同志一时跟到那边去，經過批評說服，加上客观情况的改变，許多同志又轉过来了，又脱离了那些人。立三路綫、王明路綫，遵义會議上糾正了，以后經過十年的時間，一直到七大，中間經過四年整风。經過十年是必要的，一个人改正錯誤要有个过程，你强迫一下改正不行。馬克思說：“商品是經過千百次交換，才認識其兩重性的。”洛甫开始不承認路綫錯誤，七大時經過斗争，

洛甫承认了路線錯誤。那次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大多数同志改好了。从路線錯誤来说，历史事实证明是可以改变的，要有这种信心。不能改的是个别的。可见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见效的。要有好心帮助他们。对人有情，对错误的东西应当是无情的，那是毒药，要有深恶痛绝的态度，但不要用武松、鲁智深、李逵的方法。他们很坚决，可以参加共产党，他们的缺点是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工作。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大辩论、大字报、中字报、庐山会议简报。

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一句出了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提款”没有了，浮夸也没有了。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现在有指标越落实越好，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缺点错误确实是存在的，但已经改了，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混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

革命是历史的见证人，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咀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同样。庐山出现的一场斗争，是一场阶

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还得干下去，至少还要十年二十年。可能要一、半个世纪。总之，直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熄。旧的社会斗争止熄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了。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恒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一部分人们的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

（註：此文是摘录）

对《湖南省平江县讀嶺公社 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 的情况》一文の批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

印发各同志。此件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訓是：不应该在困难面前低头。象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經濟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說，事有順乎天理，应乎人情，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覺者决志行之，則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們的犬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蝕党、腐蝕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貧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

一个重要按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

印发各同志。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軍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張凱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內的投机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場上，蓄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煥散无产阶级先鋒队，另立他們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員，就是明证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他們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錯的。他們沒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們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的。高崗反党集团的漏网残余，現在又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對他們本人都有益。只要他們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爭取过来的，因为他們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們現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綱領，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例如說，总路綫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們，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們的市場縮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針，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給他們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寬。

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 指示的报告批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二日)

印发各省市。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绪，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股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作的快，步骤也好，成绩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经验主义，还是馬列主义》的导言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各位同志：

建議讀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讀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錯誤頗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錯誤。不要紧，我們讀时可以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論上批判經驗主义，我們必須讀哲学。理論上，我們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經驗主义。現在主要危险是經驗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經驗主义，还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讀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讀全书。至于讀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們現在必須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論方面。建議从哲学、經濟学两門入手，連类而及其他部門。

对《馬克思主义者 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羣众 运动》一文的批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看一看，是我的几段話和列宁的几段話，题目叫做《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羣众运动》。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門迫击炮。向着庐山會議中的右派朋友們，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連珠炮弹。共产党內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听見炮声了嗎？打中了你們的要害沒有呢？你們是不愿意听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橫独行”，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弯”，“一轉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当做大魚釣出来”而且“有些象鉄托”，所有的人在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們出来才能收拾殘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

伙，你們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話呢？但是据說你們都是头号的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經驗，多讲缺点，少讲成績，总路綫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資产階級狂热性的表現。那么，好吧，請你們看看馬克思和列宁怎么評論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評論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請你們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那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較，是那一个好一点呢？还有，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中国建設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列宁写的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較，那一个好一点呢？你們看見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諾夫，批判那些“資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資产階級和依附于它的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猪狗們”呢？如未看見，請看一看好嗎？-

“对轉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災乐禍，散布惊慌情緒，宣传开倒車——这一切是資产階級知識分子进行階級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騙的。”怎么样？我們的右翼朋友們。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們，都爱好馬列主义，那么，我建議：将这个集体文件提供全党討論一次。我想他們大概不会反对吧？